

谍影憧憧

(美) 戴维·C·马丁著 方叙译

群众出版社

谍影憧憧

〔美〕戴维·C·马丁 著

方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WILDERNESS OF MIRRORS

本书根据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80版译出

谍影憧憧

〔美〕戴维·C·马丁著 方叙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625印张 179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85 定价：1.60元

印数：00001—30000册

前言

本书自头至尾充满了奥秘，答案却很难寻找。这就是美苏两国谍报机构之间秘密战争的历史。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两个超级大国在唯一的冷战疆场上，积极出击，互相争雄，从未止息。明枪暗剑，胜负未卜。扑朔迷离，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档案记录深奥难懂，而且了无头绪。通过七十年代对中央情报局的揭露和调查，虽使人有机会颇彻底细致地查阅了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但克格勃的档案库依旧门禁如故，在打开之前，我们绝不会确知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进行的。然而，我们却可以研究一下从美国方面发来的电讯。电文称，战况不佳，中央情报局的失败极其惨重，胜利代价高昂。克格勃想做而没做到的，中央情报局竟自己做了。

本书通过对詹姆斯·杰塞斯·安格尔顿和威廉·金·哈维二人职业生涯的描写证实了这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是英雄，是中央情报局对抗克格勃战争中最英勇善战的斗士。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们是恶棍，劣迹昭彰，十恶不赦。此时此刻我们只能说，被公诸于众的他们的秘密行动不一定是事实，这样较为稳妥。他们以隐蔽和欺骗为武器进行战斗，背信弃义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在这里被看作是道德的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却显得荒诞不经。任何战争都是如此。战争年代的赫赫的战功，在和平时期看来却

是累累的罪行。战争许可用暴力，谍报战也允许欺骗。

多少年来，安格尔顿和哈维一直驰骋在这个神秘的疆场上，从未料到还负有对社会说明自己行动的责任。如果他们不怕舆论指责，就不会接受公众忠告。如今，他们似万丈深渊之下的蝸蛎，冷不防被揪了出来，在被告席上垂死挣扎。在断定这是由于他们犯有过失还是由于工作性质所造成的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他们所处的地位。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我第一次接触安格尔顿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那时，《纽约时报》刚刚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揭露文章，把安格尔顿描写为一次针对反战与民权活动分子的大规模非法间谍行动的出谋划策者（后来证明这多少有点不公正）。那天，我在美联社驻华盛顿分社值夜班。由于我坚信安格尔顿对此事会持“不予评论”的态度，所以便通过地道的新闻通讯专线给他挂了一个电话。我们俩谈了一个多小时。从那天晚上起，我同安格尔顿进行过几十次交谈，既有电话交谈，也有当面交谈，大约已逾百次。经常同安格尔顿交谈的新闻记者不只我一个人，可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坚持的时间长，尽管他很少“泄露”可以作为素材撰写一篇新闻报道的情况，新闻虽然不多，但是安格尔顿的谈话却使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业务方面受益匪浅。这一时期里，安格尔顿给我讲述了中央情报局的组织编制、人员录用、工作惯例和内部斗争。例如，我是从安格尔顿那里头一次听说了一些关于威廉·金·哈维的更为精采的故事。

我每次给哈维打电话，他总是亲自接，但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只同他的夫人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安格尔顿鼓励我把撰写一本关于哈维的书的初步想法付诸行动，并建

议我说服哈维夫人进行合作，最好是向她指出，正因为她已故的丈夫是一个那样刚正不阿的人，所以今天才成为争议的对象。我按照安格尔顿的建议去说服她：假若哈维干了一辈子档案管理员，他的行动就不会使我发生兴趣。但是哈维夫人仍然不肯合作。我劝说哈维夫人的理由之所以值得在此一提，是因为我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要求为安格尔顿撰写一本有关他的书。但是，安格尔顿也拒绝在任何方面给予合作。

一九七八年春天，安格尔顿第一次得知我已了解了他职业活动提出的尖锐批评意见。此后，我们再没说过话。从那时起，安格尔顿一直拒绝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结果，安格尔顿尽管提供了中央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哈维的详细情况，但对本书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方面却未提供任何情况。这个决定权属于他，而不属于我。

下面谈一下其他提供情况的来源，以其重要性为先后顺序：退休的情报官员、根据新闻自由法发表的文件和社会记录。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来源所提供的情况只是片纸只字，需要进行归纳整理。由于各项行动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是严格保密的，所以情报官员通常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加之，受到保密誓言制约的人们在和记者谈话时，往往显得是在有选择地谈，这个问题便更为复杂了。政府为了保密起见，在发表的秘密文件中删掉关键字句乃至整个段落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如果官方文件的部分删节只是为了在其他方面对固执己见的见证人施加影响，那么，新闻自由法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调查工具。社会记录当然更是一鳞半爪，在许多情况下与事实完全不符。出版物以讹传讹，最后竟被误为史实，这真是令人发指。

我所采访的大多数人都坚持不要披露他们的姓名，在不说出他们身份的前提下更多地描写他们是很困难的。有一点可以在此笼统地提一笔，这些人（其中有一位女士）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持批评态度。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把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全部献给了中央情报局。对某些行动的实施方法，他们虽提出过非常具体的批评意见，但依旧忠实于这个机构，并对它遇到的困境深感不安。他们极力反对前情报官员违背誓言泄露秘密，可是反过来，自己却透露出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的情况。为了不给他们泼冷水，我从未指出这种言行的矛盾性，尽管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有时，我想他们并没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情况若同其他人告诉我的情况综合在一起，就可写成一篇更为详细的报道。有时，他们完全变成受害者，不得不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克尽职守，这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也不失为事实。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常常也是事实。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如梦初醒	(1)
第二章 诗人与警官	(12)
第三章 菲尔比原形毕露	(41)
第四章 费厄泼赖必须缓行	(68)
第五章 谍海茫茫	(105)
第六章 谋杀终告失败	(135)
第七章 有口难辩	(171)
第八章 三月十五日	(207)
第九章 大鼯鼠寻捕记	(220)
第十章 蜡烛燃尽了	(249)
后 记	(260)
作者的话	(263)

第 一 章

如 梦 初 醒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星期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女招待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仰面躺在床上，上身穿着一件草绿色毛线衫，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上穿着袜子，没有穿鞋，身旁扔着一枝0.38口径的自动左轮枪，枪上沾有从他头一个很大的伤口中流出的血。伤口是一颗软头子弹打的，子弹穿过他的右太阳穴，在左耳朵后面炸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他是在头天晚上住进这家坐落在华盛顿尤宁火车站附近的贝尔维尤旅馆的，登记的姓名是沃尔特·波勒夫，并预付了二点五美元的房钱。他的皮夹子里面有五十点零九美元，还有一个身份证，证明他是塞缪尔·金斯伯格，四十一岁，俄国人。

丝毫看不出有搏斗的迹象。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女招待敲了几下后，便用万能钥匙打开了房门。这儿没有太平梯，甚至连壁架都没有，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五层楼的窗户进出这间客房。警察发现了三张字条。在给他妻子冬妮娅的字条上，他用俄语写道：“这是非常艰难的。我非常渴望活下去，但是不可能。我爱你，我唯一的亲人。我很难写清，但

想想我的处境，你就会明白我必须走了。”在给一个叫苏珊·拉福莱特的朋友的字条上，他用德语写道：“我是带着你将能帮助东妮娅和我可怜的儿子的期望离世的。”在给其代理人路易斯·沃尔德曼的字条上，他用英语写道：“我的妻子和儿子将需要你的帮助，请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中午，验尸官写出了自杀证明书，但当警察通知路易斯·沃尔德曼他的委托人死了的时候，这位代理人喊叫着说那是谋杀。沃尔德曼说，塞缪尔·金斯伯格实际上就是苏联驻西欧军事情报系统的前头目沃尔特·克里维茨基将军，他于一九三八年叛逃到美国。沃尔德曼坚持说，克里维茨基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一旦发现我死了，尽管看起来象是车祸或是自杀，千万不可信以为真。他们在跟踪我，以前曾下过毒手。”

克里维茨基在遇刺的两年前对美国国务院讲过，他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遭到一个自称为谢尔盖·巴索夫的苏联特工人员的纠缠。“将军当时问巴索夫先生是否打算开枪打死他，巴索夫的回答是否定的，”一份国务院备忘录写道。巴索夫以含混的口吻洋洋自得地声称：“我们已看过你所写的一切，并料到你还会写的。”克里维茨基的确又写了一些东西，包括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准确地预言了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苏联一九三九年的联盟。克里维茨基还撰写了回忆录。回忆录出版后不久，克里维茨基再次找到国务院，说“他担心会遭到暗杀，因为他……觉得有几个苏联特务在监视他的住所。”

很难说清这些威胁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克里维茨基臆想出来的。他以前的朋友，保罗·沃尔说：“克里维茨

基忐忑不安，几乎把每一个人都怀疑成（苏联的）特务或间谍。”然而，克里维茨基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同他一起叛逃的一个朋友伊格纳兹·莱斯就是在瑞士洛桑市附近的一条公路旁边被找到的，他身上中了十二颗子弹。甚至连曾经为了钞票和克里维茨基闹翻过脸，并对他疑心甚大的沃尔也没敢小看这种危险。克里维茨基死前一个月，沃尔曾给他俩都认识的苏珊·拉福莱特写过信，说：“请转告你尊敬的朋友克里维茨基，一个令人感到不祥的人物——汉斯现在正在纽约……克里维茨基的行踪一贯诡秘，令人很难判断这一警告是否正确。我给你写这封信时感到很犹豫，或许还是让他们去狗咬狗更好。”沃尔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说，他曾经看到那个令人感到不祥的汉斯站在第五大道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沃尔第一次遇到汉斯是大约五年前在海牙，当时汉斯给克里维茨基开车并干些杂活。沃尔还对联邦调查局说：“汉斯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能干的开锁专家。”

克里维茨基在回忆录中称汉斯是“我执行许多不寻常的任务时最可信赖的助手”。克里维茨基甚至对汉斯讲过自己的叛逃打算，并劝说汉斯跟他一起走。但是，汉斯对斯大林忠贞不二，在劝阻克里维茨基叛逃的努力失败之后，便试图刺杀他。克里维茨基最后一次见到汉斯是在他向法国当局请求避难后不久，在马赛火车站的一个月台上。“我揣测汉斯他们的计划是在火车上绑架我，然后把我带到马赛的一个安全地方……在那里，或者扣留我，直至苏联船只到达，或者干脆把我除掉，”克里维茨基写道。但是，当克里维茨基的法国保镖掏枪时，汉斯已逃之夭夭。克里维茨基肯定汉斯被派到美国来是为了再次行刺。

华盛顿的侦探头目坚持认为，在现场发现的一切实物证据和尔后发生的一切事情“既清楚又确切地表明那个人是自寻短见”。克里维茨基死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是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附近的一个农庄度过的。这个农庄的主人名叫艾特尔·沃尔夫·多伯特，曾当过德国陆军军官。多伯特带着警察来到当地一家商店，经理和店员都十分肯定地指出照片上的克里维茨基就是沃尔特·波勒夫，在贝尔维尤旅馆发现的那支0.38口径自动手枪和软头子弹是他以前购买的。另一个警官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一个自杀案。我心里一点也不怀疑，克里维茨基住在多伯特家时，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了。”警方最多只愿意承认，克里维茨基有可能是被苏联情报机关胁迫致死的。

可是，克里维茨基并没给手枪买消声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深夜万籁俱寂，在一家旅客们经常抱怨四壁薄得象纸一样的旅店里放了一枪，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见，何况两边的客房里还都有人住。警察并没有费神去掸掉枪上的灰尘取下指纹，或检查门上的弹簧锁寻找象汉斯这样的“开锁专家”损坏门锁的痕迹。

联邦调查局拒绝调查，至少是拒绝立案进行官方调查。J·埃德加·胡佛局长在一份备忘录的下端潦草地写道：“我们不受理此案，以报纸宣传手法胁迫我们是办不到的。”然而，华盛顿分局局长接到通知说：“联邦调查局要求谨慎地调查克里维茨基身亡之事。……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以避免不得不将有关事情公诸于众。……目前联邦调查局对报界否认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联邦调查局慎重也罢，不慎重也罢，反正最终什么也没调查出来。

六年后，一名机敏的国务院研究员在翻阅从德国外交部缴获的档案时，碰巧看到了一份柏林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加密电报，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电文提到一个名叫施泰因的人“将要被派去，从华盛顿存款中付给他五百美元”。电文接着说：“施泰因住在美国，由《德意志汇报》总编辑接管，并付给他薪水……需要时，要给施泰因以帮助。”这个似乎没有什么重要内容的电报被翌日发来的另一份电报后所附加的一小段话赋予了险恶的含意，“据德军统帅部反间谍处透露，施泰因只是奉命前去跟踪克里维茨基。”

国务院给美国驻柏林政治顾问发了一份密电：“施泰因很可能是同谋，或许知道有关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死因的内情。”电报指出，德国佬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谋杀克里维茨基。克里维茨基曾“预言苏德将签订和约”，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是在一个熟人的农庄里度过的。这个人曾作过德国陆军军官，名叫艾特尔·沃尔夫·多伯特。（电报虽然没提及这些，但是德国外交部电报的日期表明，克里维茨基遇刺身亡之事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时，施泰因早已被派到美国。）华盛顿指示“检查德国外交部和反间谍处的案卷以找到更多的资料。如果可能的话，要通过《德意志汇报》及其他途径搞到施泰因的现住址、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及其同苏联警察或军方的关系。请提供全名和照片”。

六个月一晃而过，柏林杳无音信。“德国外交部至少雇用过五个叫施泰因的人，档案中却查不出任何一个曾在现在受到审查的《德意志汇报》驻美国办事处工作过，因此很难判定施泰因是谁。综合报告待发。”

柏林东部苏联占领区里有一所图书馆曾惨遭轰炸，两个调查人员在这个寒气逼人、光线昏暗的废墟里呆了十天，翻遍了《德意志汇报》的旧报纸，以期找到那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施泰因的线索。“施泰因这个名字仅有一处提到，”他们报称，“叫弗里茨·施泰因，是一九四一年巴黎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作者。”显而易见，派到美国的那个施泰因没有为付给他薪水的报社写过任何文章。

对德国外交部档案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一个一九四一年住在里约热内卢的施泰因的材料。这也许可以提供一条有希望的线索。德国外交部日志里有一则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提到“海军武官第222号电报，里约热内卢：施泰因起飞”。尽管“日志所提及的文件已被销毁”，柏林方面称，“里约热内卢的档案，尤其是班机案卷也许能够提供有关施泰因的线索。据说施泰因是在克里维茨基遇刺身亡十天后的起飞的。”

线索在这儿断了。有关施泰因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案卷一点也查不到。克里维茨基之死仍以自杀记录在案，尽管他的朋友们和羽毛日益丰满的美国情报集团里的一些官员毫不怀疑克里维茨基是被暗杀的。一位情报官员在复查此案之后说：“我个人认为克里维茨基是他杀的。”

惠特克·钱伯斯比任何人都有更充分的理由怀疑这是谋杀案。钱伯斯是和克里维茨基差不多同时叛变苏联的。由于害怕自己将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卡尔（钱伯斯是苏联控制者对他的称呼）放弃了华盛顿间谍网交通员的职务，和妻子一起逃到德托纳比奇，藏在一所平房里，夫妇俩手持一枝顶了火的左轮枪，通宵达旦地轮流放哨。鉴于伊格纳兹·

莱斯在瑞士遇刺，朱丽叶·波因茨在家门口失了踪，钱伯斯觉得他再小心也是防不胜防。波因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一天，她离开了纽约的公寓楼，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钱伯斯听到克里维茨基的噩耗之后，立即作了安排，让克里维茨基的妻子和儿子随同他的家属一起躲了起来。

钱伯斯和克里维茨基的首次会面是通过一位无固定职业的记者安排的。此人是一个被流放的乌克兰人，名叫伊萨克·坦·列文，曾协助克里维茨基整理过回忆录。当钱伯斯和克里维茨基都打消了怀疑对方是被派来刺杀自己的念头后，这两位叛逃者便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克里维茨基劝导钱伯斯跟他学，把知道的所有关于斯大林的间谍阴谋活动一五一十地告诉全世界。克里维茨基对钱伯斯说：“招供是一个义务。”钱伯斯不仅害怕具有报复心理的苏联情报机关，而且也害怕联邦调查局，迟疑不决地说：“脱离斯大林不是那么容易的。”钱伯斯对一个劝他讲出来的朋友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知道这水究竟有多深。”钱伯斯对纳粹苏维埃条约的表里不一深恶痛绝，在克里维茨基的鼓励下，他终于同意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美国政府。钱伯斯坚持要亲自告诉罗斯福总统，可是最后安排的是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钱伯斯在伯利家中呆到很晚，匆忙地写下了他所知道的苏联间谍、地下联络人和纯属同情者的姓名。其中提到了一个前程似锦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数月之后，列文告诉钱伯斯说伯利已把他提供的情况转告了罗斯福，“总统坦然一笑”。联邦调查局得知钱伯斯的口供后，J·埃德加·胡佛便以历史不清、精简机构和其他莫须有的理由将那

些人解雇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联邦调查局记录有关惠特克·钱伯斯的急办案子就此了结。”

克里维茨基也认识希斯，至少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巴尔曼的苏联叛逃者后来声称克里维茨基曾把希斯的名字列在苏联间谍的名单上。钱伯斯再次被召去接受进一步的审问，最后将以著名的“重要人物文件”形式写出指控希斯的书面证词。和钱伯斯不同，克里维茨基没有再被召去。这真是不幸。克里维茨基不仅可以帮助澄清指控希斯的证据，而且还可以为其他情况作证，这些线索更为重要，可惜被他永远地带走了。记者列文后来发誓作证，克里维茨基“告诉我……他知道两个打入英国政府部门的苏联间谍，一个在帝国委员会的机要室，另一个在外交部的机要室。……克里维茨基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金……至于另外一个，克里维茨基只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和特征，但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化名。这个人看上去是一个苏格兰青年，三十年代初期受过共产主义的熏陶，后来经劝诱进了英国外交部门”。

克里维茨基将这个情报透露给了列文，并要求他守口如瓶。可是，一九三九年秋，当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结盟突然有可能使一个驻伦敦的苏联间谍也替纳粹服务的时候，列文泄露了这个秘密。列文找到美国国务院，并通过国务院的安排会见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听了我的报告后，脸上明显地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是一笑置之。然而，由于我的确提出了姓名，而且又是经国务院介绍而来的，所以洛西恩勋爵认为这件事应该调查一下。两、三周以后，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我接到英国大使馆打来的一个电话。……洛西恩勋爵脸上的笑容似乎消失了。他们发觉金确实在英国外

交部的机要室工作，并且显然已把金监视起来了。这个情报已被证实，金被逮捕。现在，他们想知道那个苏格兰青年是谁，我甚至把他穿的是什么衣服都说了，……是根据克里维茨跟我谈的情况。”

一九四〇年一月，克里维茨基在新斯科金秘密地登上一艘英国船，由护航队护航去了利物浦。克里维茨基化名为沃尔特·托马斯，在英格兰住了一个多月，回答英国情报机关代表们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但是他拿不出有关那个苏格兰青年特征的进一步情报。不过，克里维茨基却以同样含糊的口吻向英国供出了第三个人，一个年轻的英国记者，西班牙内战期间曾被派往西班牙替苏联人搜集情报。

克里维茨基和钱伯斯这两个叛逃者虽然路走对了，但来的时机不对。如果当时能细心一点听听他们所说的，也许早就可以挖出好几个担任要职的苏联间谍。克里维茨基和钱伯斯详细地提供了苏联间谍活动的情报，然而在记者列文将它们捅到上面去之前，西方情报界没有一个人对此发生过兴趣。更有甚者，当克里维茨基担心刺客在跟踪着他，请求给予保护时，国务院却敷衍了事，含糊其词地建议他去找一下当地警察。钱伯斯叛逃四年之后，联邦调查局才找他谈话。直到一九四五年，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钱伯斯。

战前，我们对苏联间谍活动之掉以轻心几乎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固执地认为大国不会搞这样的阴谋诡计，受过上等教育的良家子弟不会背叛祖国。战争的爆发终于使美国如梦初醒，但是联合苏联反对轴心国的权宜之计使美国没有对斯大林的间谍特务采取有意义的报复行动。“遵照指